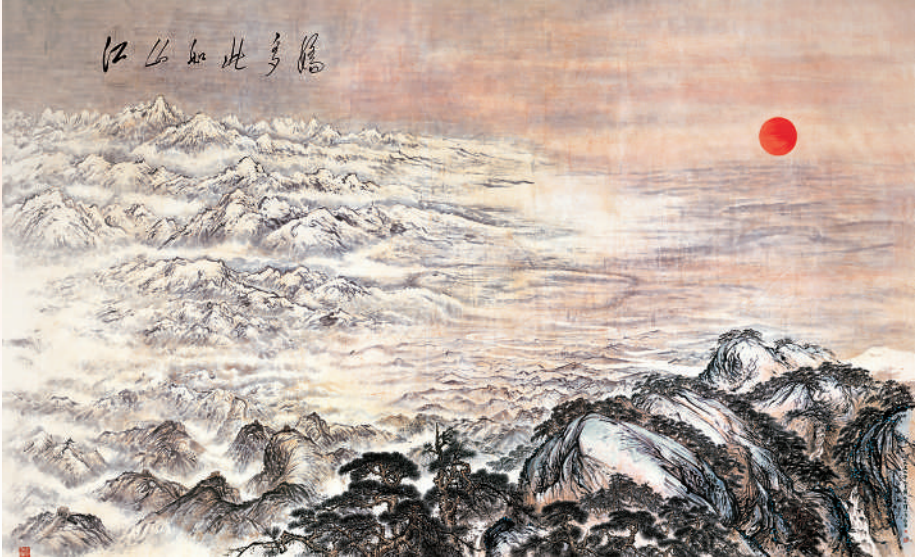


一纸“红色山水”抒写家国情怀

陈传席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我不禁想起李可染那句话：“我们画山水画也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这就是山水画的爱国主义之所在。”以山水表达爱国精神，“红色山水”是典型代表。如今再读，更能体会其情深境远。

对中国人来说，山水不只是自然之景，更是精神之寄托。纵观中国绘画史，自宋元至明清，山水画的样式和内涵基本一脉相承，或表现文人雅士隐逸之志，或抒写士大夫林泉之心，或表达深邃的禅意和哲思等。直至20世纪中叶，面对崭新的社会气象，全国各地掀起“新山水画”运动，通过实地写生彻底改变传统山水画创作面貌，以新的形式语言描绘祖国山河新貌。其中一批聚焦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等主题的作品，被称为“红色山水”，代表作品有钱松喆《红岩》《延安颂》，傅抱石《虎踞龙盘今胜昔》《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李可染《万山红遍》《井冈山》，

陆俨少《朱砂冲峭口》《芙蓉国里尽朝晖》等。这些作品一改传统山水画追求静美之境的旨趣，以雄伟浑厚的风貌创新了审美范式，为新中国山水画创作奠定新传统。

“红色山水”的创作理念是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画家们将对自身的观照转向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国家发展的赞美，以革命情怀入画。

“笔墨当随时代”，深厚的革命情怀决定着艺术家的取材和构图，也决定着其笔墨和色彩。以钱松喆《红岩》为例，红岩村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1958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并对外开放。当时，此地为一处土坡，上有几间房子，看上去十分普通。倘若如实画出来，很难生动体现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伟大的奋斗精神。出于对革命的敬意，画家把土坡夸张成一个红色的高耸山岭，既突出红色精神，又寓意红色革命性质。作品对纪念馆也作了简化处理，左

边一棵大树繁茂挺拔，不仅为画面增加分量，也给人以崇高威严之感。画家在右上题诗“风雨万方黑，红岩一帜红。仰钦奋形笔，挥洒曙光中”，点明作品象征意义以及自己内心的豪情。

创作“红色山水”，画家们不再拘泥于山水的真实，大胆想象、大胆取舍，以山水形象象征革命根基，把革命圣地升华为纪念碑式艺术。像钱松喆《延安颂》和傅抱石《延安》中，那雄伟的高山、挺劲的苍松等，都是经过艺术提炼的，以此表现革命圣地的崇高。这在以毛泽东诗意为灵感的“红色山水”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创作的《万山红遍》，采用高远法构图，以剪影式大山为主体，在黑而重的山水上，用朱砂层层积染，营造出巍峨厚重之感，尽显激越豪迈的词意。

“红色山水”成就的壮美气象，不仅开启山水画审美新范式，而且推动山水画融入时代精神。其后的山水画基本都是在这种新的审美范式下发展变化起来的。一代代画家或延续描绘革命圣地的传统，或注重将个人情感与民族精神深度融合。比如周韶华、贾又福等人，继承“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精神，将雄强气象融入山水创作。其笔下的山水，亦不是真山真水的实景描绘，而是通过艺术重塑，呈现出超越实景的美感，充满精神象征意味。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红色山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艺术风格的蝶变，更是对中国山水画如何参与时代精神塑造的深刻思考。只有把笔墨伸向壮丽的祖国山河，伸向厚重的家国情怀，在个人心象与时代气象的紧密连接中，中国山水画才能书写出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人们筑牢精神家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左上图为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一盏灯笼传递美好祝福

郭燕青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温暖和喜庆，火红的灯笼因此成为各种庆典活动中的必备之物，表达着张灯结彩、普天同庆的美好寓意。

每逢重要节日和国家庆典，天安门城楼总会悬挂8盏大红灯笼，渲染出欢庆祥和的热烈氛围。这一习惯始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这8盏大红灯笼的高度和直径均超2米，重约80公斤。如此巨大的灯笼是怎么制作的？据说是由一群手艺人在天安门城楼现场扎制而成，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工，最终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传统灯笼制作工艺复杂，需要十几道工序。通常选用竹龄3年以上的毛竹，用水浸泡，使其更有韧性；将毛竹劈成板，破成条，去掉中间的瓢；把竹条两头磨扁，插入上下灯盘扣中；再将竹条捏成骨架周正的圆形，用棉线固定，防止其走样；随后在骨架上糊上用富强粉、明矾等调和制成的糨糊，将红布仔細贴在上面，最后用金纸剪成如意云朵，“万字不到头”装饰，底端缀金色丝线流苏，一盏灯笼就“诞生”了！

灯笼制作每个环节都有不少讲究。每盏灯笼所需材料从一开始就得计算好，灯笼圆度取决于竹条数量，竹条越多，灯笼圆度越接近完美的“苹果圆”。一般直径2米的灯笼需要约40根竹条。作为关键程序的“整形”，则有赖于手艺人灵巧的双手。

竹制灯笼架结实程度相对较差，也不具备防火功能。1994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城楼上8盏巨型旧灯笼光荣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钢结构折叠式新型灯笼，具有便于运输、吊挂、收存三大优点。这样，灯笼就更加结实了，不用频繁更换，只需不定期更换灯面和灯笼穗。不过，如此一来，红灯笼更重了，总重超100公斤，需要五六个小伙子一起来力才能抬起。

做灯笼这门手艺，我是打小跟父亲学的。父亲是北京宫灯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在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工作了一辈

节假日期间，很多人选择以脚步丈量大地，在行走中阅读祖国山河，感受时代气象。来到陕西榆林红石峡，便会发现，历史就刻在崖壁之上。站在栈道仰望，80余件擘窠大字层叠错落、凌空雄峙。这里被誉为“塞上碑林”，但我更愿将它看作是一部刻在丹崖上的史书——写的是书法，也是山河壮志与家国情怀。

榆林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的衔接地带，曾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绥德镇治所。特殊的地缘让这里既是烽烟不息的军事要塞，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之地。一代代戍边将领、文臣士子把胸中抱负、山河感慨，一笔一刀镌刻进赤红色的崖壁，长年累月形成琳琅满目的摩崖题刻。红石峡摩崖题刻之风，肇始于明嘉靖年间。当时边关征战告捷，绥德镇兵备副使张珩挥笔将凯歌铭刻崖间，记下戍边将士守土功业，成为红石峡现存最早的摩崖题刻。隆庆和议后，边地迎来安宁，峡下商旅往来，绥德镇文武官员也常赴秧集会，崖壁题刻日渐繁盛。至万历年间，在崖壁镌刻巨型榜书蔚然成风，多任绥绥长官纷纷留下笔痕。“龙蟠虎踞”“万里长城”“华夷天堑”“中华天柱”，盈丈大字笔力开张，气势撼人，无不是边关将士直面山河的精神抒发，展现着其守护疆土的刚毅气魄。

入清后，红石峡榜书题刻更加兴盛。一部分题刻描摹塞上奇景——“流沙蓬岛”“榆溪胜地”等，赞叹大漠中难得

大地风华

以美传薪

爱国，是华夏儿女血脉中永不改易的情怀。

艺耕不辍，以美传薪。古往今来，一代代美术工作者心怀家国，用刀笔镌刻时代记忆，赓续精神血脉，抒写个体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紧密联系。

今天，本版约请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走进艺术长廊，从一纸“红色山水”里体悟爱国精神，从一座雕塑里倾听国歌回响，从一场展览里读懂人民力量，从一盏灯笼中品味美好祝福，从一壁摩崖上感悟古今豪情，让精神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编者



一座雕塑凝铸国歌记忆

傅军

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旋律。在上海，每当我经过淮海中路、复兴西路、乌鲁木齐中路交会处，常会望向街心花园中那尊大型聂耳铜像《起来》（见上图）。这是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创作的唯一一座矗立在国内公共空间的大型城市雕塑。这位驰名中外的雕塑大家，为何会在晚年创作这件作品？

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那一年，上海市政府计划为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建造一座纪念馆，向全市公开征集设计方案。选址就定在上述三路交会处的街心花园，因为这里离聂耳故居所在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非常近。1935年，聂耳就是在这栋三层阁楼里，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

征集通知一出，艺术家们纷纷响应。在1983年举办的“上海城市雕塑设计观摩会”上，17件聂耳纪念像设计小稿集中亮相。张充仁与同济大学著名建筑师谭垣、张行健合作的雕塑稿《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环境设计《聂耳纪念碑》在众多设计中脱颖而出，斩获最高奖。

此后，张充仁在小稿的基础上着手制作中稿。为捕捉人物神采，他走访了多位音乐家前辈和聂耳的亲朋好友，深入了解聂耳的性格和创作乐曲时的情况，甚至跑到上海交响乐团排练房参加马革顺教授指挥的《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排练，深切体会乐曲的豪迈与激情。他还从上海体育学院（今上海体育大学）找来与聂耳的体形、相貌相仿的青年学生做模特。1984年4月中旬，一尊1米高的聂耳全身像制作完成，先后在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展出。遗憾的是，聂耳纪念像项目之后迟迟没有推进。晚年的张充仁虽移居法国，却一直心系祖国，多次表达希望为家乡上海雕塑事业贡献力量的心愿。

1992年，85岁高龄的张充仁终于盼来上海市政府委托其创作聂耳纪念像的消息。同年4月，他从巴黎返回上海，并决定采用套圈的方法，依托之前1米高的雕塑像来塑造一尊3.5米高的泥塑大像，学生严友人担任其助手。经过半年艰苦工作，一尊由青铜铸成的聂耳全身像终于完成。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尊铜像立于1.2米高的基座上，聂耳身躯挺拔、面向东方，振臂指挥着大合唱，耳边似乎还能听到那高亢激越的歌声……

事实上，围绕国歌创作的雕塑还有不少，它们以一种纪念碑式的庄严感与震撼力，将集体记忆转化为动人诗篇。这些创作基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人物聚焦型，比如张充仁《起来》和吴为山《义勇军进行曲——聂耳》都以聂耳作为表现主体；另一类是精神象征型，比如叶毓山《血肉长城》和黎明《义勇军进行曲》，表现的重心都不在某个具体人物身上。表现形式也各有侧重：张充仁遵从经典的写实主义，作品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叶毓山采用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将人物聚合为不可分割的“长城”；吴为山则采用写意的手法，渲染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磅礴气势。

“起来！起来！起来！”一座座雕塑，不仅珍藏着与国歌有关的记忆，更镌刻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驻足凝望，蕴藏其间的爱国主义回响依然激荡人心，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砥砺前行。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馆长）



本版邮箱
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吴艳丽 马苏薇
版式设计
赵德汝

统”“汉蒙一家”，记录多民族和睦共处的图景。这些擘窠大字结体茂密雍容，展现了力满气沉的豪壮之情，文字阴刻、阳刻交替运用，底纹处理各异，留下了大型摩崖刻字的技术典范。还有少见的蒙文题刻，映照出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

诸多摩崖题刻中，最令人心绪激荡的，是东崖上马占山将军所书的两处“还我河山”。这也是红石峡现存年代最晚的大字题刻。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1941年冬，马占山、邓宝珊两位将军到访红石峡，面对满壁古人题咏，想到祖国山河破碎，马占山悲愤填膺，便挥手下写“还我河山”。这四个大字穿越风雨，成为刻在崖壁上的民族呐喊。每每驻足瞻望，总能感受到那份滚烫的爱国赤诚。

从明代戍边官吏的守土壮志，到清代各民族相融共处的祈愿，再到抗战年代抵御外侮的铮铮誓言，红石峡摩崖题刻串联起数百年的家国叙事。在这里，笔墨不再局限于纸素，而与高山峡谷共生，任凭风沙雨雪磨洗，为后世登临者留下“方精神世界”。雄强的书法呼应着豪情壮志，笔墨风骨与家国情怀在此完美合一。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依然叩击着人们心扉，让人读懂前入山河壮志，厚植爱国之情。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左上图为红石峡摩崖题刻。王劲供图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下图为“人民·丰碑”展出的陈妍音雕塑《歌唱我的祖国》。